责编：龚克　E-mail:gongke@ccps.gov.cn　Tel:010—62806124　　2014年10月6日

专家视点

掌握好“看家本领”

——学习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有关论述

□聂锦芳

2013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这实际是他多年来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论断，是总书记基于理论逻辑、历史经验教训和现实发展对全党提出的要求。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党的“看家本领”，那么更进一步则可以认为，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家本领”。作为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者，我们从习近平同志的有关论述中受益良多，体会颇深。

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本功

把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看作是深入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条件和重要途径，是习近平同志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史”“论”“著”三者的逻辑关系而做出的重要判断。早在2011年5月14日，在出席中央党校开学典礼时他专门围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发表了长篇讲话，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包含着经典作家所汲取的人类探索真理的丰富思想成果，体现着经典作家攀登科学理论高峰的不懈追求和艰辛历程”。2012年6月1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调研时，他特地考察了该校的“《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再次要求“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代表性著作，追本溯源，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习近平同志的上述论断具有极强的针对性。长期以来，相当多的干部、群众，也包括为数不少的理论工作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式是学习原理教科书。在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这当然是一条“便捷途径”，而且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效果。但是，如果要更加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复杂内涵和深广意蕴，仅靠原理教科书又是不够的；它过于抽象的概括和表述方式由于省略了对很多思想观点的演变过程和曲折的论证环节的梳理和分析，很容易将基本原理概念化、条块化乃至一定程度地简单化。而如果回到经典著作，回到文本的特殊语境和历史序列之中，情形就会大大改观，经典作家极为宽广的理论视野、丰富的知识领域、多样的论证方式、广泛的思想议题和独特的思考角度就会充分展现出来，通过系统地学习、研究和思考，将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更加全面、客观和自觉，这与我们长期以来通过教科书所把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在别人心目中形成的那种简单、刻板、思辨乃至教条的形象会有很大的不同。

不仅如此，系统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也有助于廓清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中出现的那些重大的争论、存在过的误读和曲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哲学界不断出现的、引起很大反响的热点问题，诸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辩证法的核心和规律、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美的本质、“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唯生产力论、异化与人道主义、社会革命与生产力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和实质、哲学体系改革、本体论问题、现代性与社会发展、“以人为本”、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这些问题引起争议起初非常热闹，但很多讨论难以持续、鲜有定论或者不了了之，这其中当然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但除了那些特殊的时代氛围和背景，是不是也与论者多以思辨的方式立论有关呢？尽管争论者也引用过经典作家的不少言论，但多数是离开这些话语由所产生的特定文本语境和具体所指而做的抽象摘引，而没有把其原始内涵和界域阐释清楚，因而最终难以做出判断和结论。而如果我们回到经典作家的原始文献，就会清楚地看出这些问题在他们那里是在什么意义上提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具体含义、在其整个理论框架中占据怎样的位置、他们的观点具有什么特殊意义和超越性质、时代的发展对其学说能做出怎样的检视和判断。通过这些工作既可以使经典作家的真实思想及其意义得到澄明，同时也廓清了这些问题延展到当代的现实境遇和新的内涵。

理解复杂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的风向标

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不仅有助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也是把握复杂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必不可少的条件。社会上有一种不正确的看法，认为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是有意回避现实问题、搞“本本主义”“经院哲学”和“烦琐哲学”，因而体现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习近平则从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执政、面对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着繁重的执政使命”这样的战略高度，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蕴含的“理论思维”是今天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有力支撑”，对于我们“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书写改革开放历史新篇章”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

再过4年，即2018年5月5日，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在这200年的沧桑变迁中，世界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革，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参与了这一历史进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言说了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迄今为止并没有获得人们明确的认知和深刻的理解，反而愈益陷入聚讼纷纭的境地，很多言说和理解离开了经典作家的原始文本及其思想演进。而就20世纪而言，不在少数的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其原生形态，而更多地依赖于其后继者在特定的现实境遇下的阐释、发挥与重建。这当然是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使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考虑到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质及其在21世纪的命运，清理这段思想“公案”和历史“公案”对于在当代新的境遇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却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前提性工作。而离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所谓“总结历史经验”就是一种虚妄。

迅猛推进的全球化态势提供了理解和评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要参照系，更加凸显出她的当代价值。谈及全球化，我们必须追问：全球化的实质是什么？如今的“全球化”态势仅仅是属于当代突兀生发出来的现象吗？究其实，它是由“资本主义首次开创的世界历史”在当代的延续和发展。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对“世界历史”时代现象的描绘及其实质的揭示至今仍未失其效准。资本奔走于全球各地，“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样，资产阶级就“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个由资产阶级“按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的世界必然会出现畸形、扭曲和不平衡发展，世界历史体系的总体结构必然具有“等级森严的性质”；全球化时代也并没有改变这种态势，超越这一规律。正因为如此，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能仅仅限于提出一些具体的路线、方针和策略，更应当是一种思想体系、基础理论的建树；而对它所具有的“世界意义”的阐发，则必须借助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当代全球化态势的准确把握。但我们遗憾地看到，很多人谈论的却是“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多么反常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强调重新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虽然不能指望从中找到解决当代具体问题的方案，但对照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思考来反思目前中国与世界的状况，将使我们大受裨益、深获启迪。

提升经典原著学习和研究的新高度

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都多次强调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党的事业的极端重要性，他不仅率先垂范，认真研读，而且多次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书目，指示由中央专门发文督促执行。此后，历代中央领导同志也在各自长期的工作经历和领导实践中，倡导并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经典著作。习近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强调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表明了我们党在指导思想、学习传统、理论资源上的相承、坚守和发展。特别是他告诫我们，学习和研究这些经典“浮光掠影不行，浅尝辄止不行，必须专心致志地读、原原本本地读、反反复复地读，通过细嚼慢咽去感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历久弥新的思想价值”。这段话，对于我们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在今天，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具备了更为良好的文献基础和条件。一方面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的编辑、出版和研究状况看，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刊发的大量新的资料，完整地再现了他们准备、写作、修改和整理其著述的曲折过程、完整的理论视野和深邃的思想内涵，提供了重新客观、完整而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权威版本。另一方面从中文版的情况看，随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以及更为完善的列宁、毛泽东等人著作集的陆续出版，提供更为准确的中文版本，同时也把更加深入的文本解读、思想阐述和价值评估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在这种情况下，在全党、全社会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加强研读与思考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的连通、理论与实践互动以及专业研究成果的普及和推广，一定能提升经典原著学习和研究的新水准，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提供理论保障和智力支撑。

在健全完善制度中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上接第1版）

全面落实社区矫正工作基本任务。严格执行刑罚，加强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和社会适应性帮扶，是社区矫正的基本任务。要坚持把教育改造社区服刑人员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中心任务，狠抓各项基本任务落实。要切实加强监督管理。严格落实监管制度，防止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严格检查考核，按规定实施分级处遇，调动社区服刑人员的改造积极性；大力创新管理方式，充分发挥矫正小组的作用，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监管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要切实加强教育矫正。认真组织开展思想道德、法制、时事政治等教育，帮助社区服刑人员提高道德修养，增强法制观念，自觉遵纪守法；组织开展社区服务，培养社区服刑人员正确的劳动观念，增强社会责任感，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大力创新教育方式方法，实行分类教育和个别教育，普遍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不断增强教育矫治效果；建立健全教育矫正质量评估体系，增强教育矫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切实加强社会适应性帮扶工作。制定完善并认真落实帮扶政策，协调解决社区服刑人员就业、就学、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社会保险等问题，为社区服刑人员安心改造并融入社会创造条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发挥社会帮扶的综合优势，努力形成社会合力，提高帮扶效果。

积极推进社区矫正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建设。社区矫正是严肃的刑罚执行工作，必须依法规范进行。要积极推进社区矫正立法，努力从法律层面上解决有关重大问题。要加强规章制度建设，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完善工作规定，确保这项工作规范运行。要深入推进社区矫正执法规范化建设，健全执法机制，完善执法流程，加强执法检查，切实规范执法行为，努力在每一个执法环节、每一起执法案件办理上使人民群众、社区服刑人员及其家属感受到公平正义。

切实理顺社区矫正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社区矫正工作机构、队伍建设。科学合理的体制机制和健全的机构和队伍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保证。要理顺工作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指导管理，法院、检察院、公安等部门协调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区矫正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要加强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建设，健全省、市、县三级社区矫正机构，重点加强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专门机构建设。要切实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着力加强县、乡两级专职队伍建设，同时，发展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队伍，组织和引导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要大力加强队伍培训，努力提高社区矫正队伍思想政治和业务素质，更好地肩负起社区矫正职责任务。

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保障能力建设。全面推进社区矫正，离不开必要的经费和基础设施保障。要切实抓好社区矫正经费落实，按照财政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将社区矫正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并探索建立动态增长机制。要大力推进场所设施建设，多形式、多渠道建立社区矫正场所设施，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接收宣告、集中学习和培训。要大力加强社区矫正信息化建设，科学规划，统一规范，建立社区矫正信息平台，不断提升社区矫正工作的信息化水平。

党的思想史

邓小平的执行力

□董　洁

回顾邓小平的一生，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还是在只争朝夕的和平时期，邓小平身上都体现出高超的执行能力。这既是他之所以得到党中央、毛泽东认可并被委以大任的重要原因，也是他能成功领导地方、治理国家的重要原因。

不折不扣的执行力度

执行贵在坚决。贯彻上级正确战略意图，实现既定目标，必须不折不扣。革命战争年代，打仗异常艰苦。邓小平作为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对来自中央的作战命令，总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一点在千里跃进大别山、进军大西南和指挥进军西藏等时期均有所体现。国共内战爆发后，正当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大军鏖战鲁西南时，毛泽东认为刘邓大军唯有迅速直插大别山地区，逼近南京、武汉，方能全面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为此，毛泽东给刘邓发去加急电报。当时部队在连续作战后极度疲劳，且伤亡较重、亟需休整补充，但刘伯承、邓小平在接到电报后，经过简单商量，马上复电中央表示立即执行。邓小平日后说起这段经历时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行动，这是毛主席定下的，种种艰难我们都克服了”。千里跃进大别山，是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一个伟大转折，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接连取得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天下大势初定后，为剿灭国民党在西南的残余势力，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率军解放大西南。这对邓小平及其所率部队而言又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在经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之后，部队特别需要休养。因此，进军大西南的任务下达后，二野部分指战员中出现了一些不良情绪。一些人畏难怕苦，一些人则认为，解放战争以来二野吃的苦特别多，不应再担负这样艰巨的任务了。邓小平就此召集专门会议研究决定，在二野中开展加强国家观念与大局观念教育。1949年8月17日，邓小平在二野、三野团级以上干部扩大会议上指出：“去西南是要多走一点路，苦一点，可这是党指定的光荣任务，为了取得全国胜利也得去，没有任何的犹疑。”经过一番思想动员和教育，部队中的不良情绪得到纠正。这为顺利执行中央关于解放大西南的决定奠定了思想基础。

大西南解放后，由邓小平担任第一书记的西南局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征粮剿匪、恢复发展生产，二野部队不少官兵脱下了军装，转为工作队。正当军民忙于生产建设、热情不断高涨之时，1950年1月，毛泽东提出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并对进军时间给出了明确意见。进军西藏的任务事关重大，在接到毛泽东的部署电报后，邓小平和刘伯承等西南局领导人立即从军事、政治、组织和后勤等各方面着手进行准备工作。经过艰苦准备和战斗，1951年9月人民解放军一部进入拉萨，完成了中央交付的任务。邓小平在客观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克服困难、不折不扣完成任务的执行力度值得我们学习。

积极创新的执行态度

执行贵在创新。执行不是简简单单地照葫芦画瓢，在一些开放性战略目标的贯彻过程中，有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建立在独立思考基础上的创新举措完成既定目标。正是凭借积极创新的执行态度，邓小平在行军打仗和治国理政领域，总是能够“超额”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

1944年7月，毛泽东给七个地方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负责人发去一封电报，列举了“请予电复”的十个问题，内容涉及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方方面面。此举有调查研究、集思广益之意。时任北方局代理书记的邓小平在报告中认真逐条回复。12月9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此报很好，请转发平原、山东、华中、湖北、东江各处。”毛泽东对邓小平这种高效能的办事态度和条分缕析的高质量报告很是满意，曾评价说，“看邓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

邓小平积极创新的执行态度不仅体现在撰写报告上，还体现在具体实践中。如在指挥淮海战役期间，邓小平作为总前委书记，和刘伯承、陈毅等坚持独立思考、判断敌情，适时向中央军委提出第二阶段先打黄维兵团的建议，创造性执行了中央军委决策，取得了圆满成功。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时说：“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这足见党中央对前线高级指挥员的信任。李达曾回忆说，解放军能够取得全歼黄维兵团的胜利，是因为前线高级指挥员有把握全局、审时度势，临机决断的高超指挥艺术和勇于承担风险的宏伟胆略，“由于他们深刻领会并创造性地贯彻了中央军委关于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的战略意图，因而取得了最佳战果”。

正因为邓小平高超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极佳的执行力，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力荐邓小平出任总书记。他说，邓小平同志“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执行才干较为欣赏。

雷厉风行的执行速度

执行贵在速度。好的战略目标一旦形成，就应当在第一时间推行。邓小平常说，看准了就抓紧干起来，对的就坚持，不对就抓紧改。雷厉风行的执行速度也是邓小平在贯彻目标过程极为看重的。

恢复高考制度，就是在邓小平的强力推动下，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实现的。1977年8月举行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有专家提出抓紧恢复高考是选拔人才的好方式。邓小平听闻后，当即询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恢复高考是否还来得及？刘西尧答复说，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后当场拍板：“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不过，在随后召开的1977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上，与会人员在要不要废止群众推荐、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以及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路线“两个估计”等问题上，分歧很大、争论不休，导致落实恢复高考制度的问题一拖再拖。关键时刻，邓小平于9月19日召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等人谈话，严肃提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这番话语可谓掷地有声。教育部负责人随即向出席招生会议的代表传达了邓小平的谈话，并迅速组织起草了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意见。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高考的决策自此尘埃落定。

事实证明，没有雷厉风行的执行速度，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推动起来。改革开放初期，当人们对经济特区产生质疑、办经济特区面临较大压力之时，是邓小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迅速坚定了人们的信心。1984年初，邓小平前往深圳、珠海等地调研考察，回京后对部分中央负责人谈，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不应当是收而应当是放。当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北起大连南到北海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同样，在后来的开发开放上海浦东问题上，邓小平亦表现积极，多次谈及上海是我们的一张王牌。1990年2月，邓小平专门找到中央负责人，指出他们要管、要抓紧干起来。当年4月，中央就作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

当下，中国进入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想如期完成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奋力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迫切需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执行力。邓小平在执行力度、态度、速度三个层面的思想与实践，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